

殷商与两周用鼎制度的区别研究

李玉洁

(河南大学中国古史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ese the system of using Ding tripod was divided into two culture system: Yin and Zhou. In the Yin culture system the combination of Ding tripod takes on even number form and represents that the Yin people pursue symmetrical beauty and respect female. Relatively in the Zhou cultural system the combination of Ding tripod takes on the odd number form, represents the supreme position come into being, and reflects the Yin and Yang thought and grade consciousness of Zhou people.

Key words: Shang Dynasty; Western and Eastern Dynasties; system of using Ding tripod; thought of Yin and Yang

摘 要: 中国古代的用鼎制度分为殷、周两大文化系统。殷商文化系统是鼎的组合, 呈偶数形式, 表现出殷人追求对称美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而周文化系统的礼器鼎的组合形式呈奇数, 表现了周天子至高地位的形成, 反映了周人的阴阳思想和等级意识。

关键词: 殷商; 两周; 用鼎制度; 阴阳思想

鼎是中国古代的盛食器, 广泛的用于先秦时期的中国。贵族们又称为“钟鸣鼎食”之家。在宴享中, 贵族们为了表现自己高贵的身份, 把盛食器皿分为不同的规格和等级。殷、周时期的用鼎制度是不相同的, 并反映出不同的思想意识。中国古代的用鼎制度分为殷、周两大文化系统。殷、周两大文化系统的用鼎制度, 特别是鼎的组合形式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殷商文化系统鼎的组合呈偶数形式, 表现出殷人追求对称美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而周文化系统的礼器鼎的组合形式呈奇数。奇数组合可以突出一个“居中”、“中央”、“太极”的地位, 然后再形成对称形式, 表现了周天子至高地位的形成, 反映了周人的阴阳思想意识。

一、殷商文化系统的用鼎制度

人类的一切现象都离不开数字。有人认为, 数字构成了人类社会。在对数字的使用中和万物有灵思想的支配下, 人们对数字有了神秘感, 赋予数字以灵性。他们认为某些数字主吉, 某些数字主凶。人们把“一”当作万物之始, 把最早出现的事物称为“一”。“二”则是成双的意思;

“三”为众多之意。中国最早产生的数字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正是人们两只手的手指之数。为了对这些数字进行区分, 人们又把这些数字分为奇数和偶数。1、3、5、7、9, 是不对称的, 被称为奇数; 2、4、6、8、10 是对称的, 被称为偶数。殷商文化系统鼎的组合, 就是呈偶数形式出现。

墓葬中的随葬品集中反映了古代人们生活的文化习俗和思想意识。商朝前期, 礼器鼎的使用尚无一定的规格形式; 商朝后期, 殷人逐渐形成了对青铜礼器鼎的使用形式和规格。我们可以从殷朝的大型王室墓葬妇好墓随葬的铜礼器鼎, 研究殷代礼器鼎的组合形式和使用制度。

妇好墓铜礼器鼎的组合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即每一类型的铜礼器鼎成双、或呈偶数组合的形式成套出现。如后母辛大方鼎二件, 成对; 妇好长方扁足鼎、VI 式妇好细高柱足鼎; II 式妇好中型圆鼎, 六件一套; III 式妇好中型圆鼎, 六件一套; 另外, VI 式妇好小型柱足鼎、妇好小型簋、妇好有盖方彝、大方尊、大圆尊、子束泉圆尊、妇好鸮尊、后母辛四足觥、方壶、扁圆壶、妇好甗、妇好方罍、大圆罍、妇好封口盃皆

是二件成对。妇好联体甗四件一套，妇好分体甗四件，二套；妇好高体觚四件一套；妇好镂空爵六件一套，妇好四棱觚六件一套，I式妇好平底爵十件一套^[1]。还有，妇好墓中亦有些样式的鼎，如妇好小方鼎等仅一件，但偶数的、或成对出现的铜礼器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故妇好墓铜礼器的偶数组合形式是主流。

铜器鼎的偶数组合形式还见于其他殷代墓葬。北京平谷县发现的商代中期墓葬，出土饗饗纹鼎二件，形制完全相同；小方鼎二件，形制大体相同^[2]。安徽阜南米寨区常庙乡发现铜甗一对，铜觚一对，铜爵一对^[3]。安阳大司空村M51出土铜鼎二件，铜卣二件。简报报导比较简单，但说二铜鼎、二铜卣皆各为一式，那么铜鼎、铜卣应是成对出现的。

殷商贵族在铜礼器鼎的使用方面有独立的文化系统。先秦时期，我国的东部、南部地区是指东夷、南淮夷、南方楚国，加之西部的秦国，均为受殷商文化影响的地区。殷商部族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区方国，与殷商的文化系统相同，皆具有偶数崇拜的意识。

东夷地区、淮夷、楚国以及西方秦国皆是殷文化所及地区，这些地区礼器的使用形式与殷商王朝有一致性。1979年山东日照崮河崖发掘一座墓葬，编为一号墓。这个墓共出随葬品14件。其中大鼎二件，成对；小鼎一对，壶一对，盆一对，鬲四件，其大小形制花纹相同。

淮河流域，即古代所谓“南淮夷”地区发掘的先秦时期的墓葬中所见的礼器亦呈偶数的组合形式。如河南光山县发现的黄君孟夫妇墓。黄君与夫人墓各随葬有鼎、簋、壶等礼器，皆成对出现。河南固始白狮子墓地M1出土鼎二，壶二，皆成对。

楚墓中随葬礼器鼎的组合形式方面表现出殷文化的特点。西周时期的楚墓发掘数量不多，特点也不太明显。目前发掘的主要是东周时期的楚墓。江陵雨台山的楚墓中随葬礼器，无论鼎、簋、壶或鼎、敦、壶组合，这两种组合同出一墓时，大都每种器物出相同的两件。一墓同出两种组合的即形成鼎四，簋二、敦二、壶四的情况。

长沙地区共发掘楚墓1800多座，随葬器物多为陶器鼎、敦、壶或鼎、簋、盒、壶，亦常出相同的两件。有些墓出土陶礼器的基本组合是每套4件、6件或8件^[4]。

河南淅川下寺共发掘9座大型的春秋时期的楚墓。

M1出土礼器36件，其中有4对鼎，簋一对；缶一对。龙耳虎足方壶一对^[5]。

M3出土鼎两对，饮鼎一件，铜簋四件一套，形制相同，缶二对，铜提链壶一件。

M10出土鼎4件一套；簋一对；缶二对。

M11出土铜鼎一对，饮鼎一件，缶一对。

M7鼎一对，簋一对，缶一对。

M2即“令尹子庚”墓，出土“王子午”升鼎7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簋、铜俎、铜禁各一件、簋二件等。令尹子庚墓出土的列鼎七的形式，一般被认为是吸收了周文化的结果。楚墓中礼器鼎的主要形式是成对出现。荆门包山M2出土升鼎二、镬鼎二、簋二、敦二、壶六、缶二对等。

秦国当是对中国后代影响较大的诸侯国。秦是嬴姓部族，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秦的先祖恶来、蜚廉皆曾臣事殷商；大约武王灭商后，从东方迁到西方，以善于养马服事周王室。秦因臣事商族，故受殷文化的强烈影响，在礼器鼎组合形式上与殷商部族有一致性。四川成都羊子山M172是战国末的秦国墓葬。墓中出土大铜鼎一，当为镬鼎；二个秦式小铜鼎，当为升鼎，成对。另外，河南三门峡市后川M2001是一座战国后期的秦国中型木椁墓。墓中以铜鼎一对随葬。有学者认为，“把成都羊子山M172和后川M2001联系在一起考虑，就可以认为至迟在战国晚期秦人已往往把五鼎以上的规格，改为用铜二鼎。”“战国末的鼎制，尤其是秦国鼎制，同周初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6]笔者认为，成都羊子M172和后川M2001两墓的铜二鼎制，当是秦国鼎制受殷商文化的影响，与殷人的礼器组合制度有一致性，而绝非秦人对周制的改变。

殷人与其文化影响所及的东夷、南淮夷、楚国、秦国等地区使用礼器鼎的组合形式和使用制度基本是鼎与簋、敦、簋、壶、缶等器物一样皆成对或呈偶数组合的形式出现。

二、周文化类型的用鼎制度

自西周以降，周天子至尊的观念日益突出；春秋时期，阴阳学说亦已出现。人们又用阴阳学说的思想意识去附会礼器鼎的组合形式。西周以后的典籍记载较详，结合考古发掘，更清晰地表

现出周文化类型的礼器鼎的使用制度。周文化系统的礼器鼎的组合格格，呈奇数形式出现。

《仪礼》中的《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记载了士在各种礼仪中鼎的使用制度和组合形式。

《士丧礼》记载“陈三鼎于门外。”又云：“东方之饌；两瓦甗，其实醴酒；角觶，木栖。骹豆两，其实葵菹芋醢；两筴无滕，布巾，其实栗不择，脯四脰。”士的丧礼用的礼器组合是：三鼎、两豆、两筴、两甗。

《既夕礼》记载“陈五鼎于门外”，“东方之饌，四豆，脾析、蜃醢、葵菹、羸醢；四筴，枣、糗、栗、脯。”郑玄注曰“鼎立，羊、豕、鱼、腊、鲜兽各一鼎也。士礼，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五鼎，即少牢也。”也就是说，士礼，当用三鼎；但因这是葬前之盛奠，故加一等，用少牢之礼。

《仪礼·少牢馈食礼》记载大夫（或诸侯）的祭祖之礼：“雍人陈鼎五，三鼎在羊饔之西，二鼎在豕饔之西。”又云“佐食，上利执羊俎，下利执豕俎，司土三人执鱼、腊、肤俎。序升自西阶，相从入设俎。羊在豆东，豕亚其北，鱼在羊东，腊在豕东，特肤当俎北端。”这里提到饔，即煮牲之鼎；在少牢馈食礼中用五鼎、五俎。还记载有四敦，用以盛黍稷稻粱。

《仪礼·公食大夫礼》记载的是国君宴请下大夫的小聘之礼，云“甸人陈鼎七。”“宰夫自东房荐豆六”，“设黍稷六簋”，“设鉶四”。也就是说，诸侯国君宴请下大夫之礼的礼器组合为七鼎、六簋、六豆、四鉶。

国君宴请上大夫之礼为“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俞伟超先生认为“礼食之时，鼎有一俎，九俎即有九鼎。此‘公食上大夫礼’亦礼加一等。”^[7]则公食上大夫之礼，当用九鼎，八簋，八豆，六鉶。

《仪礼·聘礼》亦记载了诸侯国之间相互聘问宴享的礼节。宴享时所用的礼器组合是“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夹六。”这里记载的是两套礼仪。贾公彦疏云“是堂上与门外之饌也。……云鼎西九东七者，九谓正鼎九，牛、羊、豕、鱼、腊、肠、胃、鲜鱼、鲜腊；东七者腥鼎，无鲜鱼鲜腊，故七”。郑玄注“八、六者，豆数也。凡饌以豆为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两簠、八壶。西夹

六豆、六簋、四鉶、两簠、六壶。”

由此可见，使用两套礼器组合，九鼎与“饌八”是招待上卿之礼，而七鼎与“饌六”是招待上介（即副手）之礼。

《周礼·秋官·掌客》记载：天子接待上公之礼“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鼎、簋十二，牲三十有六，皆陈。飧饔九牢。”

天子接待侯伯之礼：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壶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陈。飧饔七牢。

天子宴享子男之礼：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壶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牲或腥）鼎十有八，皆陈。飧饔五牢。

《掌客》记载天子宴请各级诸侯之堂上皆“鼎、簋十二”。郑玄注“鼎十二者，饪一牢，正鼎九，与陪鼎三，皆设于西阶。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夹东夹各二。合言鼎簋者，牲与黍稷但食主也。”鼎、簋，这是国君宴享天子所用的主要的礼器。

西周至春秋时期，各级贵族宴请、祭祀所使用礼器鼎的组合形式大体情况是：

天子接待诸侯之礼用九鼎（另有羞鼎三）、八簋、六豆、十六豆、十六壶。

诸侯国君宴请他国使臣的上卿礼为：九鼎、八簋、八豆、八筴、六鉶、八壶；宴请卿的副手之礼为七鼎、六簋、六豆、六筴、四鉶、六壶。

少牢馈食之礼是五鼎、四簋、四豆、四筴、二鉶、四壶。

士礼所使的礼器组合为三鼎、二簋、二豆、二筴、二壶（或两甗）。

陕西宝鸡市茹家庄发掘的西周墓 M1 乙室，墓主为伯，时代为康、昭时期。M1 乙室出土鼎 13 件，其中方鼎 8 件，圆鼎 4 件，带盘鸟足鼎 1 件，簠 5 件。鼎、簠形制大小各不相同。而在 M1 甲室中出土一套列鼎 5 件，形制花纹相同，大小相次，铜簠四件，完全相同。M1 甲室的墓主，研究者认为是伯之妾，说明西周时期列鼎已经出现。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材料与以上文献记载的礼器组合具有一致性，但又不完全相同。如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发现虢国墓地。其中 M1052 是虢国太子墓。墓中出土的礼器组合是七鼎六簋六鬲。M1706、M1810 两墓出土的礼器组合是五鼎四簋四鬲。M1705、M1721、M1820 三墓出土的礼器是三鼎、四簋、二鬲^[8]。

河南辉县琉璃阁 M8 出土有盖列鼎五、无盖列鼎七、鬲六、簋四、罍二等; M55 出土的有盖列鼎五,无盖列鼎七,簋四、鬲六、簋四、豆二、壶二等; M60 出土大鼎一,有盖列鼎五,有盖列鼎九,无盖列鼎九等^[9]。

以上出土材料与古代文献所记的礼器组合形式基本相符,但也不完全与文献所载相同。文献典籍记载的是规范化的礼器组合形式,而在实际使用中又比较灵活。综合以上论述可知,周代礼器的组合是有一定规律的。鼎,俎是按奇数组组合,即一、三、五、七、九的等差形式递增(或递减);簋、簠、豆、鬲、壶是按二、四、六、八的等差形式递增(或递减)。

三、殷商与两周用鼎制度的差别反映了不同思想意识

综合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殷文化系统的用鼎制度采取偶数的组合形式,周文化系统的用鼎制度采取奇数的组合形式,殷、周的用鼎制度存在着重大差别。

殷文化系统影响的地区包括殷商王朝及东夷、南淮夷、楚国、秦国等地区,周文化系统影响的地区包括周王朝及其所臣属的诸侯国。

殷、周两大文化系统使用礼器鼎的组合形式的不同,不仅表现殷、周文化的背景不同,也表现他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想意识的不同。

周人使用礼器鼎的组合制度表现出阴阳思想意识和等级意识。西周时期,阴阳的概念是指太阳而言,向阳处为阳,不向阳处为阴。如《诗·大雅·公刘》云“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就是说,人们在选择居处时要选向阳的地方。我国把山南水北称为“阳”,把山北水南称为阴,也正是这个意思。

西周时期,阴阳协调,天地万物才能生长繁荣的概念已经产生。《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幽王二年,岐山一带发生地震。史官伯阳父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韦昭注曰“蒸,升也。阳气在下,阴气迫之,使不能升也。”即地震的原因是阴气压迫阳气,阳气不能上升,即阴阳不能协调造成的。伯阳父解释得尽管不十分准确,但西周时期的人们以阴阳解

释自然现象,认为阴阳调和才能使天地和谐的学说已经产生。

阴阳学说在认识上是符合哲理的。天下任何事物都是由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使事物得以和谐发展。

古人称太阳为阳,月亮为阴;又进而称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认为阴阳必须协调,才能生长万物,使万物繁荣。人们这种阴阳观是富于哲理的,是正确的。然而古代社会充满着巫术思想,在人们对大自然认识的同时,也开始把这种阴阳思想附会到社会人事政治之中。

人们把数字与阴阳学说相结合,对数字赋予阴阳学说的内容,并开始用奇数、偶数解释天地万物。人们把奇数当做阳数,象征天、君、父、男;把偶数当做阴数,象征地、臣、母、女等。《易·系辞上》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京房易传》卷下云“奇偶之数,取之于乾坤。乾坤,阴阳之根本。”又云“初为阳,二为阴;三为阳,四为阴;五为阳,六为阴;一、三、五、七、九,阳之数;二、四、六、八、十,阴之数。”奇数和偶数被附会成阳阴之数。

周人以奇数为阳,象征天、君、父、男,以偶数为阴,象征地、臣、母、女,很明显地有崇尚奇数的意识。周人崇尚奇数的原因是“周道尊尊”。西周时期,至高王权已经出现。奇数可以突出一个“居中”、“中央”、“太极”的地位,然后再形成对称形式,从而表现出周天子的至高地位。《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太祖的至尊地位确定以后,三昭三穆表现出一种对称与平衡。周天子与诸侯国君自称“孤”、“寡人”,正是为了表现其至高地位。

这种以奇偶数字表示阴阳的巫术思想意识被周人运用在礼器的组合方面。《礼记·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笱、豆偶,阴阳之义也。”孔颖达疏曰“鼎、俎奇者,以其盛牲体;牲体动物,动物属阳,故其数奇。笱、豆偶者,其实兼有植物;植物为阴,故其数偶。故云阴阳之义。”又疏曰“鼎、俎奇者,案《聘礼》牛一、羊二、豕三、鱼四、腊五、肠胃六、肤七、鲜鱼八,鲜腊九也,是鼎九,其数奇也。”“《少牢》陈五鼎,羊一、豕二、肤三、鱼四、腊五,其肠胃从羊,五鼎也。五俎,又听俎一,非正俎不在数。《特牲》三鼎,牲鼎一,鱼鼎二、腊鼎三;

亦有三俎，听俎一，非正俎不在数，是皆鼎俎奇也。……筯豆偶数者，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礼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礼，筯与豆同，则是筯、豆偶也。”也就是说，在宴享或祭祀之礼中用的礼器，鼎、俎用奇数，因鼎中所盛、俎上所载的是羊、牛、豕、鱼等牲肉。牲为天之所生，属阳，盛器用奇数形式。豆，筯以及簠、簋、敦中所盛放的是粟、枣、黍、稷、谷物，这些农产品皆地之所产，属阴。壶中所盛放的是酒，酒为粮食和水酿成，亦为阴，故豆、筯、簠、簋、敦、壶的组合皆为偶数形式。

周人及其所臣属的诸侯国在宴享、祭祀及各种社交礼仪上，对礼器的使用与组合形式皆附以阴阳之义，盛放天之所生的动物食品的鼎，用奇数组合形式，象征阳；盛放地之所产的植物食品的豆、筯、簠、敦、簋、壶用偶数组合形式，象征阴。《郊特牲》云“阴阳和而万物得”。只有阴阳相和谐，万物才能滋生繁荣。

周文化系统礼器鼎的组合形式，反映周人的阴阳思想意识，还反映出其等级意识。《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周礼·秋官·掌客》所记的堂上九鼎、八簠、十六豆、十八簋，皆上公招待周天子所用的礼器之数。《仪礼·少牢馈食礼》所记的是五鼎当是大夫一级使用的礼器组合。《仪礼·特牲馈食礼》记的“三鼎”是士一级贵族使用的礼器组合。这种礼器组合的等级形式并不是自西周建立以来就有的，而是在使用中逐渐形成的。

周文化系统鼎及其他礼器的组合形式反映了周人的阴阳思想意识和等级观念。

殷文化系统的礼器鼎的组合形式与周文化系统的差别是：鼎与簠、簋、敦、壶一样皆呈偶数组合形式，没有阴阳思想意识。

殷人的偶数崇拜当是其礼器偶数组合形式的重要原因之一。殷商王朝遗存的文化表现了偶数崇拜意识。殷代有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殷人以十天干、十二地支相配合来纪日，如甲子、乙丑、丙寅……等等。殷人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每月3旬，每旬十天；又将一天分为8个时

辰：明（旦）、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夕等。殷人十天干、十二地支之数的形成，每年十二月份的划定，每天八个时辰的划分都表现殷人对偶数的崇尚。

殷人对偶数的崇尚还表现在其墓葬文化中。如安阳武官村大墓南北两端各有一条墓道。该墓曾经盗掘，现底部仍可看出有30根圆木铺垫，自椁顶至墓口共有30层夯土，北墓道杀殉16匹马，4犬，2人。南墓道杀埋12匹马。墓室有二层台。东侧二层台有殉人17人（当缺一）西侧二层台有殉人24人。墓室上部的填土中有人头34个。从这座经过盗掘的墓葬来看，墓中椁室铺垫的圆木、夯土、殉人、殉马、殉犬皆呈偶数组合。安阳小屯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有殉人16个，殉犬6只。这些都表现殷人崇尚偶数的意识。

殷人为什么崇尚偶数并喜爱使用偶数组合的礼器呢？这也是近年国内学术界很感兴趣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殷商时期，人们虽有晴、雨、阴天的概念，但还不具有阴阳学说中所理解附会的内容。当时的人们还未把天、君、父、男附会成阳性，以奇数代表；把地、臣、母、女附会成阴性，以偶数代表。

（二）在殷人的心目中，虽然亦以男性为尊，但对女性的尊重也是殷商社会的特征。《史记·梁孝王世家》云“殷道亲亲，周道尊尊。”《礼记·表记》又云“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亲亲”表示殷代对母系的尊重。殷代祭祀先公先王的同时，必以先妣相配，这在甲骨卜辞中是不乏其例的。殷人祀典中，虽然只有其子为殷王的先妣可以入祀。但祭祀先妣时，必须在先妣所名之日致祭。如祭妣辛时，即“大甲爽妣辛”，必在辛日，不是在先祖太甲的祭日一甲日举行；突出的是先妣，而不是先祖，表现了殷人尊重女性和两极平衡的意识。

殷代妇女有很大的权力。如殷高宗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是一个可以统兵上万的女将。如卜辞记载“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10]从甲骨卜辞的记载来看，妇好是武丁信任的将领，在对夷方、土方、羌方的战役中，她统兵上万，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妇好还有主祭权，如“贞，乎帚好出于父□。”^[11]“贞勿乎帚好往夷。”^[12]出、夷皆是祭名。妇好生前拥有大量的财富。1976年安阳殷墟发现了她的墓葬，

该墓共出土随葬器物 1928 件, 包括青铜器 468 件, 玉器 700 多件, 宝石制品 40 多件。许多青铜器上铸有“妇好”和“母辛”的子样。“母辛”是子辈对母辈的称呼, “妇好”与“母辛”当为同一个人^[13]。

不仅妇好, 殷王朝的许多妇女都受到尊敬, 并拥有财富。如解放前发现的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 是迄今所见到的体积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但这是属于祭祀女姓的祭器。

在殷代, 王妃设有专门的宗庙, 称为“司室”^[14]或“司母大室”^[15]而且在很多卜辞皆见有“司室”之类的记载。卜辞中还经常见到“设司室”, 于省吾先生《甲骨文字释林》一书之《释设》中认为是将物品陈列在诸妃之宗庙的祭祀。

殷人使用偶数鼎的组合形式是在阴阳意识尚未出现的时期, 男子独尊的意识尚未形成, 妇女地位是较高的。殷代对偶数的崇尚, 以及使用偶数组合形式的礼器, 都表现了一种对称和平衡。对称美是美学的重要内容, 表现了殷人的两极意识, 这是他们崇尚偶数及使用偶数的礼器鼎组合形式的重要原因。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2] 北京平谷发现的商代墓葬 [J]. 文物, 1977(1).

[3] 葛介屏. 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 [J].

(上接 41 页) 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 1997 年发掘简报 [J]. 考古, 1998(10).

[39] 邹衡. 试论夏文化 [M] //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40] 郑振香. 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 [M] // 中国考古学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42] [55] 贾金标等. 关于葛家庄遗址北区遗存的几点认识 [J]. 考古, 2005(2).

[4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45] 我们认为: 中商期陶器分大、中、小型三类, 并各自形成不同的演变序列, 不能交叉类比。

[46] 今本《竹书纪年》一般认为出现于明代, 其具体成书年代不可考。

[47] 本年表的制作参考了董作宾《殷商疑年》, 见《董作宾卷》[M].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48] 丁山. 商周史料考证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

文物, 1959(1).

[4]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 浙川下寺春秋楚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5] [6] 俞伟超. 先秦两汉考古学论·周代用鼎制度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三门峡虢国墓, 第 1 卷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8] 郭宝钧. 山彪镇与琉璃阁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9] 李学勤. 英国所藏甲骨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50.

[10] 郭沫若. 甲骨文合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609.

[11] 甲骨文合集 (2641).

[12] [13] 郭沫若. 卜辞通纂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3: 764.

董作宾. 殷虚文字外编 [M]. 艺文出版社, 1956: 347.

高承祚. 殷契佚存 [M].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33: 843.

罗振玉. 殷虚书契前编 [M]. 艺文出版社, 1970: 4. 27. 8.

[14] 郭沫若. 殷契粹编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5: 1251.

[15] 胡厚宣. 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 [M]. 上海: 群联出版社, 1954: 4615.

(责任编辑: 曹汉刚)

版社, 2008.

[49] 王国维.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M] // 观堂集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50] 此为《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 《水经·洹水注》引文与此不同, 盘庚下有“即位”二字。

[52] 李维明. 小双桥商文化遗存分析 [M] // 夏商周文明研究.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53] 李维明. 小双桥商文化遗存浅析 [N]. 中国文物报, 1997-10-19.

[58] 今本《纪年》载盘庚十四年自奄迁于殷, 其说若确, 盘庚在位前期亦应包括在中商第三期中。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等. 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 2005~2007 年勘察与简报 [J]. 考古, 2010(1).

[62] 唐际根等. 洹北商城的发现及其意义 [N]. 中国文物报, 2004-10-8.

(责任编辑: 曹汉刚)